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

历史与现状

知识出版社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 历史与现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编
自然辩证法研究资料编辑组

知识出版社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历史与现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编
自然辩证法研究资料编辑组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7 $\frac{1}{2}$ 印张 字数485千字

1983年10月 第1版 1983年10月 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书号：2214·5 定价：2.40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内容包括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历史评述、文献选编、研究进展和记事四个部分。

历史评述对自然辩证法传入中国前夜的历史文化背景，全国解放前上海、延安、重庆等地自然辩证法学习研究活动，建国后十七年的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情况作了评述。

文献部分有毛泽东、朱德、吴玉章、李富春、徐特立等同志有关自然辩证法文章、讲话，自然辩证法的规划、会章，代表性的学术论文。

研究进展是关于自然辩证法经典著作、基本理论、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宇宙学、地质科学、心理学、“三论”、方法论、工程技术、农业科学、医学、科学学研究现状的综述。

记事包括大事记、主要学术会议、学术刊物、组织机构介绍。

本书可供自然辩证法专业工作者和关心我国自然辩证法事业历史和现状的同志参考。

278570

高松著
杜其之譯

自然辯證法

神州國光社出版

分發行所	總發行所	法蘭西	德意志	蘇俄	日本	中國	南洋
上海	上海	巴黎	柏林	莫斯科	東京	北京	新加坡
上海	上海	巴黎	柏林	莫斯科	東京	北京	新加坡

一九三二年八月在上海出版的第一个自然辩证法的中译本

自然辯證法研究小組

暑期舉行座談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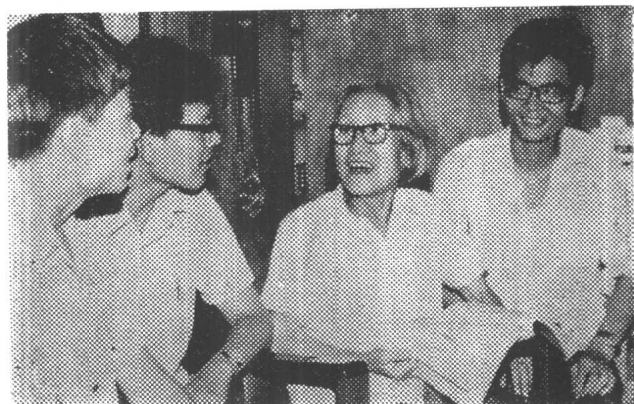
本市第一自然科學研究會之組織，自成立以來，對於自然辯證法之研究，特由徐志親自擔任指導。本

月三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半，假文化俱樂部召開第三次座談會，討論工業農科之應用。

延安《新中华报》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日关于自然辩证法活动的报导



一九七八年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期间，
于光远同志和一九五八届党校部分学员合影



陈珪如教授和研究生在一起

周伟民摄



方毅同志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年会上讲话



周培源同志主持会议



于光远同志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
暨首届学术年会闭幕式上讲话



张文佑教授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
暨首届学术年会上讲话

代 序

我和自然辩证法

——一九六六年前我在这方面经历的回忆

于 光 远

条条道路通向共产主义。对于我来说，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体系来接受，使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学习和研究自然辩证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与许多同时代的青年革命知识分子也许没有多大不同，决定我走到党领导的革命道路上来的不是哲学，而是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时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现实。当时从年龄上说我正处在一个人世界观形成的时期，我经历的种种事实，使我不仅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且十分痛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并且在进大学后开始追求共产主义，并且和友人一起自发地到群众中去做点宣传和组织工作。但是最初实在不懂得多少道理，如果说还有点理论知识的话，那也是很不系统的。我只看过几本小册子，懂得的只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点道理和一点最基本的共产主义常识。后来我也买到过几本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如陈豹隐翻译的半卷《资本论》，可是一因自己水平低，二因译文实在难懂，啃了一下没有啃动。结果还是“行动在先”，在几个简单的概念指导下参加了革命活动。

我认真阅读而且自己觉得读懂了的第一和第二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著作就是包括有许多自然辩证法内容的《反杜林论》和

《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那是在一九三六年我在清华大学读四年级的下学期。我选读了哲学系的一门“形而上学”。讲课的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张申府教授。感谢他在学习参考书目中列入了上述那两本书（不是中译本而是英译本），它们就摆在阅览室里，借起来非常方便。这样我在图书馆里从头到尾读完了这两部重要著作。

这两本书大大提高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认识。在读这两本书之前，我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关于社会政治的革命主张来看待。我相信它是正确的，而且非常合乎我的心意。但是不知道它在哲学上竟是这样的博大精深。这两本书一下子把我吸引住，在科学上完全征服了我，也把我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在这里我想插进来讲一讲再早一点的情况。我在初中一年级的時候，莫名其妙地对中国古代哲学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从思想内容来说，完全没有值得讲的，也没有什么可讲的，只有一点它竟使我对哲学发生了兴趣，而且经久不衰。三十年代初到上海在高中读书，开始对当代自然哲学发生了兴趣，在东方图书馆、大同大学图书馆和座落在亚尔培路的中华学艺社图书馆，翻阅过上百本有关的书籍，绝大多数没有细读。也有看得稍为仔细一点的，绝大多数都早已忘却。不过也有一些至今还记得的。比如在怀德海的一本书里，他以空间为纵坐标，时间为横坐标，画了一根表示速度为光速的质点运动的直线，接着说如以纵坐标为轴，这条直线旋转时形成的面为界限所形成的“圆锥形”内是不可能存在任何事件（Events）的，理由是世界上不可能有比光速快的运动，在这本书中他大讲构成宇宙的是事件而不是物质的道理。又如一个德国科学家名叫莱因巴哈有一本书，在这本书里，他从在金属球上静电荷只存在于它的表面这个事实，对电的本质发表了一大通议论。这样的议论很多。我读了这些东西产生了许多疑问，觉得有许多自然哲学问题要研究。我上大学时就是抱着对自然哲学的兴趣选学理论物理学的。我在上海大同大学学了两年

年之后转入清华大学。在四年级写毕业论文我的导师是周培源老师，选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关于广义相对论的。论文当然是理论物理学的。但我在头脑中却在考虑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我想自苹果从树上年复一年地落到地上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牛顿才找到了万有引力定律，为什么牛顿之后这么久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定律没有作出说明呢？我很想探讨一下困难所在，想利用写论文的机会先好好学一点广义相对论。但是直到那个时候，我还只有研究自然哲学问题的兴趣，却不懂得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作这样的研究。当时正是“物理学危机”叫得很响，或者已经叫了许多年，但是对于我国学者来说还是比较新鲜的时候。我对这种观点也没有批判的能力。总之，在政治上我虽然已经明确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但是在自然哲学方面我的思想还是不清楚的。

正在这样的時候，我读了恩格斯和列宁写的那两部著作，这两部书对我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可是那时正是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又处在抗日战争的前夕，我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青年运动，我在自然哲学方面的认识虽然有了提高，但是并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自然哲学或自然辩证法的研究。

一九三六年暑假大学毕业后，在去广州就业之前，在老家上海参加当地的“救亡活动”。这时候上海的同志正酝酿成立一个“自然科学研究会”。这个组织的性质是党的外围团体。以前这种性质的团体，有团结作家的左联，团结社会科学家的社联，还有团结新文字拉丁化积极分子、世界语积极分子的团体等等，但是没有团结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团体。党一直没有团结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团体的原因是因为自然科学家中左倾分子比较少。在一九三六年时情况不同了。“一二·九”后在原先学自然科学的人中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一种要求进步的倾向。这个研究会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起的。这个会的酝酿工作我没有参与，但是我被团结进去了。它的第一次会我有机会参加了。在这次会上除了李光、邹

强等同志是熟人外，还认识了好几位同志，廖庶谦、孙克定、章汉夫、陈珪如、钱保功等就是那次会上认识的，第一次会艾思奇同志没有到，但是开会时提到了他，说这个会他是发起人之一。

第一次会是在上海大世界旁边的东方旅社开的，只讨论了会务并讨论了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的公开信，没有讨论自然科学理论问题。以后几次会是在震旦中学开，倒是讨论了自然辩证法问题，讨论的对象是辛垦书店出版的果林斯坦的《自然科学新论》。这本书是《自然辩证法》在苏联出版后写的，有介绍和评述恩格斯这本书的内容。米丁的《新哲学大纲》的中译本（艾思奇翻译的）是那年六月出版的，那本书当时也已定为我们学习的一本“参考书”。

那时候新知书店刚建立，要研究会的同志写一套通俗宣传自然科学的小册子。为此还专门开了一个作者的会，我也答应他们写一本，可是没有交卷。

在我去广州后这个研究会的活动就没有再参加。

在广州虽然没有类似上海自然科学研究会这样的活动，倒有一点读书的时间，也继续关心自然辩证法方面的问题。岭南大学物理系的教员每周有一次习明纳尔，有一次轮到我主讲，我以“辩证法和物理学”为题作了一次报告。报告后系主任（美国人，基督教徒）站起来一连提了六七个“为什么”来责问我。后来我觉得自己真傻，对这样的人讲辩证法真是白费气力。不久因为我在广州组织的一个青年团体被国民党破坏，我就离开了广州。

从一九三七年初到一九三九年七月，我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党的青年工作，没有接触有关自然辩证法的工作。依我所知这两年在国民党统治区也没有人从事这方面的活动。而在一九三八年延安却成立了一个新哲学会，在动荡的年代，延安解放区成立这样的学术团体我感到是很难得的。

到延安后有两件事是应该说一说。

第一件事就是上面说的新哲学会。这个会成立时同自然科学

没有多大关系，在一九四〇年六月下旬召开的年会上，提交年会的论文中也没有关于自然辩证法方面的。只有我在这次年会的发言中讲了点自然辩证法方面的例子，得到亲自到会的毛泽东同志的注意。这个事实，我在《科学的光辉在延安闪耀》这个回忆中叙述过了，在这里不再重复。

第二件事是一九三九年五月在延安建立了一个自然科学研究院。这个研究院在一九三九年底开过一次科学讨论会。在会上曾强调过要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自然科学。这个研究院成立时我不在延安，那个讨论会我也没有参加。我参加的是一九四〇年初开始筹备“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工作。这个研究会的组织工作开头屈伯川同志和我做得比较多，我和他一起向毛泽东同志汇报。请毛泽东同志出席研究会的成立大会的情形，在上面提到过的那个回忆录里也记载了这样的事情。

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是一九四〇年二月五日举行的。毛泽东同志亲自到会演讲。开会的情况延安《新中华》报有报导，成立会议的宣言也全文在这家报纸上登载过。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改变了生产关系”，取得了更好的“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这样的“社会制度是更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他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者“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会议的性质和它的隆重举行，使得它在我国自然科学史上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差不多与研究会同时成立，也改组为延安自然科学学院，成为革命根据地第一所多科性的自然科学方面的大学。在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就有了进一步的开展。

在这个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宣言中，有一条就是开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统一问题的研究，也就是主张要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研究自然科学。于

是负责这个研究会日常工作的驻会干事会就建立了一个从事自然辩证法方面工作的小组来组织推动这方面的工作。一九四〇年党中央号召加强干部的理论学习，规定每年五月五日马克思的诞辰日为干部理论学习的节日，于是党中央各单位就带头组织读书会。其中最有名的有洛甫小组和陈云小组等。在六月间评定学习模范小组时，名列前二名的就是这两个小组。洛甫小组就是每次开会都由洛甫（即张闻天）同志在中央宣传部主持的学习米丁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小组。陈云小组就是陈云同志在中央组织部主持的学习艾思奇和吴亮平同志写的《唯物史观》的小组。这两个小组我都参加了。有关延安这些小组的情况，一九七九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怀念“读书会”，组织“读书会”》中提到了，在这里我也不多写了。当时除了有名的洛甫小组、陈云小组外，八路军军政学院何思敬等同志也组织了《资本论》小组。在这样浓厚的读书空气下，我们自然科学研究会得到徐特立同志的支持组织了一个学习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小组。当时我在中央青委宣传部做文化活动方面的工作并且兼任延安中山图书馆的主任。于是就在中山图书馆（有时借用延安文化俱乐部——两家是近邻），每星期都举行会议。

这个学习小组用的学习材料主要是《反杜林论》。同志们手上都有这部著作的中译本，而没有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好在中山图书馆有阿杜拉斯基编的马恩全集（德文本）。在这部全集中《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编在一卷里。对《自然辩证法》的翻译工作我比较早就开始了，对《反杜林论》的校译工作是在每次开会前做好准备。每次开会前先由个人在自己的书上作修改然后讨论。学到整风前，《反杜林论》的哲学部分基本上学完。

关于自然辩证法方面的工作不只在学习小组中经常进行。研究会还在《解放日报》上办了一个《科学园地》的副刊，也经常登点有关自然辩证法方面的文章。恩格斯的关于写《自然辩证

法》的总计划草案，我就以《自然辩证法著作大纲》为题在这个副刊里发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也发表过我翻译的、并请景林同志帮我校对过的《从猿到人过程中劳动的作用》。

在战争烽火的岁月中，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延安自然科学工作者并没有忘记纪念牛顿这样一位伟大科学家。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举行了纪念牛顿三百诞辰集会，《科学园地》发表了徐特立同志的纪念文章。

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一九四四年延安大学开设了全校师生都听的大课，这门大课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自然发展史，（2）社会发展史，（3）与当前现实结合的理论问题。第一部分的讲授由我担任，第二部分的讲授由张如心同志担任（他当时是延安大学副校长），第三部分的讲授由周扬同志担任（他当时是延安大学校长）。

由于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六年中间我一直没有离开陕甘宁边区，其他抗日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自然辩证法方面的工作，了解得很少。在这些地区的工作也有许多成就，这是不成问题的。

我们不能夸大延安时期在自然辩证法工作的成就。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也不能否认所进行的这些工作的意义。在革命时期需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发展的时期，对我们的干部是如此，对包括从事科学教育工作者以及技术工作者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也是如此。作为讲社会发展史的引言，自然发展史的学习，如在延安大学所做过的那样，证明是有成效的。除在延安时做过的那样，一九四八年党中央机关在河北平山县时也采用这个办法，学习成效也不错。于是在新解放的城市中从讲自然发展史，讲从猿到人过程中劳动的作用，进而讲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成为一项卓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

除了在在职干部教育系统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外，在干部学校和高等学校也有开设这种课程的。一九四九年我自己就在当时的协和医院上过课。一九五五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也开设了《自然和自然发展史》的课程。

解放初期，自然和自然发展史学习的广泛进行，使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译本的要求很迫切。于是就在延安时期我翻译的基础上作出版中译本的准备。这个工作由曹葆华同志负责。为了便于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学习，在全部译文未定稿之前就先出版了《自然辩证法导言》和《从猿到人过程中劳动的作用》单行本。这个单行本几年中重版了多次。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札记中我们也选出一部分，编成一本书名为《辩证法与自然科学》出版。这样在全译本出版之前就可以初步满足学习的需要。全译本是一九五五年才出版的。

全国解放使自然科学事业的地位大大提高。国家建设需要我国自然科学有一个迅速的发展。在科学力量上除来自革命根据地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他们的人数不多）外，原先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大量人才现在为人民中国服务。在组织机构上，人民政府接收了原先为国民党政府管辖的中央研究院，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全国高等学校、农业、工业、交通等部门的科学研究机构也相继建立。在这种情况下用马克思主义武装我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科学研究者讨论中发生的问题等就成为必须认真看待的问题。从一九五二年起，中央宣传部的领导要当时部内的理论宣传处（这个处当时由我负责）研究科学工作中的政策与方针问题，并与中国科学院及其他科学机构保持较密切的联系。以后这个工作由中央宣传部设立的其他同志负责的科学卫生处——后改为科学处来负责。一九五四年起我又兼科学处的工作。由于要做好任何工作都应该掌握有关这项工作的规律，科学处的同志于是就把研究自然科学的规律性作为自己的任务，把“论科学”作为一个研究的课题。在工作中科学处的同志深感一定要研究自

然辩证法，认识到它是党领导科学工作的一个科学基础。大家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事实：当我们的工作做得正确的时候，后来总结时会认识到这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指导下的结果，而当我们的工作长期没有成绩或遭受损失时，后来总结起来往往就是因为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或者误解了马克思主义。例如错误地批判某些本来是完全正确的科学观点，就同对自然辩证法的误解有关。遗传学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李森科批评他的对手时有一条论据叫做“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我们就议论：辩证唯物主义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论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不是明明白白地讲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吗？不是明明白白地把“必然的东西被说成是唯一在科学上值得注意的东西，而偶然的東西被说成是对科学无足轻重的东西”当作一种错误的观点予以批评吗？又李森科反对遗传物质的存在，我们就议论：遗传物质的存在在哪一点上违反了唯物主义？难道遗传物质不是物质而是什么精神的东西吗？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这就说明学习和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必要。在一九五六年夏天青岛举行的遗传学座谈会上，我们不仅努力去贯彻党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且也对辩证唯物主义、对自然辩证法的原理在遗传学中的应用进行了阐述。

自然辩证法包括的内容如此广泛，在这个领域要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果难度是非常大的，这就需要在我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联盟，需要哲学工作者和在各个领域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努力，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规划，也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于是在我国制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时，专门制定了《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规划》，并且决定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内建立一个自然辩证法研究组，我兼任了这个组的组长。这个人数不多的研究组是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自然辩证法的组织（现在它已扩大为一个研究室了）。这个研究组从1956年10月起就办了一个刊物《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自然辩证法十二年研